



“战国策”派主办报刊中的 生存危机叙述

徐 旭◎著

The Narration of Existential Crisis in Newspapers and Periodicals Edited
by the *Zhan Guo Ce* School



中国出版集团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战国策”派主办报刊中的 生存危机叙述

徐 旭◎著

The Narration of Existential Crisis in Newspapers and Periodicals Edited
by the *Zhan Guo Ce* School

中国出版集团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广州·上海·西安·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战国策”派主办报刊中的生存危机叙述 / 徐旭著. —广州：
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2015.12
ISBN 978-7-5100-9934-2

I. ①战… II. ①徐… III. ①中国文学—文学研究—
民国—文集 IV. ①I206.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318889号

“战国策”派主办报刊中的生存危机叙述

责任编辑 宋 焱

出版发行 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

地 址 广州市新港西路大江冲25号

[http:// www.gdst.com.cn](http://www.gdst.com.cn)

印 刷 北京振兴源印务有限公司

规 格 710mm × 1000mm 1/16

印 张 11.75

字 数 200千

版 次 2016年1月第1版 2016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100-9934-2/G · 2006

定 价 36.00元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摘 要

《战国策》半月刊和《战国》副刊是“战国策”派主办的两种期刊，也是“战国策”派撰文论述的主要阵地。“战国策”派在这两种期刊上发表的文章，十分明显地透露出了“战国策”派对当时的中华民族所面临的生死存亡危机的沉重忧虑。

“战国策”派首先提出了当时的中华民族所面临的第一重危机，即时局观危机。时局观危机意指当时的中华民族处于世界范围内的“战国时代”，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威胁，而当时的国人却未能认清这一时局，并极度缺乏战争意识。紧接着，“战国策”派又提出了当时的中华民族所面临的第二重危机，即整体观危机。整体观危机意指当时的国人过于追求个人自由，缺乏团结意识，从而妨害抗日救亡。最后，“战国策”派还提出了当时的中华民族所面临的第三重危机，即力量观危机。力量观危机意指当时的国人一方面“失丢现实”地认为力“不应当有”，另一方面又“错解真象”地赋予力以恶的属性，从而缺乏尚力意识，以致消极的和平主义论调泛滥成灾。但是，指出当时的中华民族面临的生存危机之所在并非“战国策”派奋力呼号的根本目的，解决当时的中华民族面临的生存危机才是“战国策”派的殷切渴望。于是，针对三种危机，“战国策”派转而向西方借镜，分别标举出三个模范人物。不过，这些模范人物并不完全分别等同于他们在客观世界中的原初形象，因为他们其实都是“战国策”派运用想象而制作出来的异国形象。无论是对危机存在的意向，还是对危机模范的想象，这后面都潜藏着“战国策”派应对危机的一整套相应理论在支撑着，即“战”、“国”、“策”。“战”强调国人要树立战争意识，“国”强调国人要

团结一致、共御外侮，而“策”则强调国人要勇于应战、努力应战。

所以，《战国策》半月刊和《战国》副刊上的文章实际上都是“战国策”派对当时的中华民族所面临的生存危机的一种叙述。就此而言，“战国策”派至少应该是一个爱国的文人团体。

关键词：“战国策”派，危机，意向，想象，信仰，报刊

Abstract

Both the semimonthly of *Zhan Guo Ce* and the supplement of *Zhan Guo* are edited by the *Zhan Guo Ce* school. In these newspapers and periodicals, a series of essays written by the *Zhan Guo Ce* school conveys the serious existent crisis about the Chinese nation.

From the *Zhan Guo Ce* school's point of opinion, the Chinese nation are faced with three serious existent crisis. The first crisis is about the concept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The Chinese nation of the time don't know they are living in a war-time and lack war-consciousness. The second crisis is about the concept of the collective. The Chinese nation of the time fall over themselves for private freedom and lack the solidarity-consciousness, which go against the Anti-Japanese War. The third crisis is about the concept of the power. The Chinese nation of the time consider the power is immoral and shouldn't be advocated. The final motive of the *Zhan Guo Ce* school are not pointing out the crisis, but looking for a way which is apt to resolve these crisis. So the *Zhan Guo Ce* school look over the western world, and then find out three excellent models for the Chinese nation to imitate to reply these crisis. All of these models are not same with their original images in the objective world, because they are all foreign images imagined by the *Zhan Guo Ce* school. In fact, whether the imagination of theses foreign images, or the intention of those existent crisis, it is based on a complete theory about crisis management made by the *Zhan Guo Ce* school. The *Zhan Guo Ce* school use "Zhan", "Guo" and "Ce" to generalize that complete theory. "Zhan" means that the Chinese nation should get the war-consciousness. "Guo" means that the Chinese nation should be united. "Ce" means that the Chinese nation should take up

arms to fight with the Japanese.

In a word, essays in the semimonthly of *Zhan Guo Ce* and the supplement of *Zhan Guo* convey serious existent crisis on the Chinese nation. For that matter, the *Zhan Guo Ce* school is a patriotic scholar group at least.

Key Words: the *Zhan Guo Ce* school, crisis, intention, phantasy, belief, newspapers and periodicals

自序

今年是“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而本书的主角——“战国策”派恰恰与“抗日战争”、“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密切相关。

提到“战国策”派一词，人们往往就会联想到西汉末年刘向所汇编的《战国策》一书，并下意识地以为“战国策”派就是指《战国策》一书的作者群。实际上，“战国策”派指的是1940年春在云南昆明教授群中出现的一个思想文化流派，其主要活动是创办并编辑《战国策》半月刊和重庆《大公报》之《战国》副刊。当下，许多学者都对“战国策”派很陌生。但在“抗日战争”中期和新中国建国初期，“战国策”派可谓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在“抗日战争”中期，“战国策”派的一系列尚力、主战的论著曾引起相当大的社会反响。尽管当时的学者们对“战国策”派褒贬不一，但毕竟使“战国策”派声名远播。而在新中国建国初期，学者们则对“战国策”派展开了大规模的批判。于是，一系列批判“战国策”派的论著使“战国策”派再次声名远播。对“战国策”派的褒与贬都与“抗日战争”和“反法西斯战争”密不可分，因为褒扬“战国策”派者认为“战国策”派尚力、主战的论著鼓舞了“抗日战争”、支持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而贬斥“战国策”派者则恰恰认为“战国策”派尚力、主战的论著宣扬了法西斯主义、妨害了“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长期以来，批判“战国策”派的声音始终大于理解“战国策”派的声音。直到最近十来年，重评“战国策”派并为“战国策”派正名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其实，“战国策”派虽然尚力、主战，却丝毫与法西斯主义无涉。很显然，并不是所有尚力、主战的论调都是法西斯主义。对此，应该在具体的语境中进行具体的分析。就当时国弱民疲的客观现实而言，中国自保尚且力不从心，如何能够实行法西斯主义而侵略他国？由一群学贯中西的高级知识分子所组成的“战国策”派又如何能不明白这

一道理？事实上，“战国策”派尚力，是为了增强中国抵御外侮的力量，而非为了扩张侵略外国的力量；“战国策”派主战，是主张对日反击的自卫之战，而非主张对外扩张的侵略之战。可以说，“战国策”派的尚力、主战与法西斯主义的尚力、主战截然不同。其实，这种区别可以说就是反法西斯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的区别。进而言之，“战国策”派所崇尚的是反法西斯之力，所主张的是反法西斯之战。所以，在日寇入侵、国土沦丧、主权渐失的危难时刻，“战国策”派以共御外侮、保家卫国为目的指向的尚力、主战论调应该说是无可厚非的。

本书就是在立足客观史实的基础上，深入阐释“战国策”派尚力、主战以共御外侮、保家卫国的思想文化主张。事实上，从揭举中华民族所面临的生死存亡之危机，到标举具体的应对危机的西方模范，直至提出富于理论性的危机处理建议，“战国策”派在他们所创办、编辑的《战国策》半月刊和重庆《大公报》之《战国》副刊上表现出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战国策”派固然已归于逝去的历史，但他们的爱国之心却可与世长存。值此“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本书的出版或可为纪念之属。

是为序。

徐 旭

2015年5月27日于武汉

目 录

引 言	001
第一章 “战国策”派关于危机存在的意向	010
第一节 时局观危机的意向	013
第二节 整体观危机的意向	020
第三节 力量观危机的意向	027
第二章 “战国策”派关于危机模范的想象	036
第一节 上进异国模范的想象	041
第二节 善战异国模范的想象	050
第三节 尚力异国模范的想象	052
第三章 “战国策”派关于危机处理的信仰	062
第一节 现实之“战”的信仰	065
第二节 集体之“国”的信仰	073
第三节 强力之“策”的信仰	083
结 语	093
参考文献	095

“战国策”派主办报刊中的生存危机叙述

附录一	“战国策”派重要成员	100
附录二	17期《战国策》半月刊目录	103
附录三	31期重庆《大公报》之《战国》副刊目录	108
附录四	5期《民族文学》月刊目录	110
附录五	已发表的“战国策”派研究论文	115
后 记		173
跋		178

引言

1938年10月，“武汉会战”的结束标志着日军“速战速决”侵华计划的彻底破灭。虽然“中国必亡”的论调被极大地撼动了，但“抗日战争”（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起止时间为1937年7月7日至1945年8月15日，简称“抗战”）自此也开始进入遥遥无期的战略相持阶段。如此这般的时局，一方面增强了当时的国人坚持“抗战”的决心，另一方面也加重了当时的国人取得“抗战”胜利的焦虑。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员，当时的学术界中的诸位学人显然也不能例外。事实上，他们都曾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淋漓尽致地表达了这种决心和焦虑。

1940年4月1日，聚集在云南昆明的三位大学教授——云南大学文法学院教授林同济、西南联合大学历史系教授雷海宗和西南联合大学外国语文学系德文教授陈铨，成立“战国策社”，并克服经费紧张、发售不便等重重困难，创办、发行《战国策》半月刊以宣传其思想文化主张。《战国策》半月刊原定于每月1日和15日出版，但由于时局变化、经费紧张、纸张短缺等各种原因的限制，其出版时间并不太固定。及至1941年7月，《战国策》半月刊终因“空袭频仍，印刷迟缓，物价高涨”^[1]而停刊，当时共计出版17期16册（第15期和第16期合刊为一册），每册刊登文章五至八篇不等。就在《战国策》半月刊被迫停刊后不久，其编者又转而借助当时全国发行量最大的报纸——《大公报》的传媒优势，在《大公报》上开辟《战国》副刊，继续刊文宣传其思想文化主张。《战国》副刊的出版时间相对固定，除第21期刊于《大公报》周二第四版外，其他各期都刊于《大公报》周三第四版。自1941年12月3日至翌年7月1日，《战国》副刊一共刊出31期，每期刊登文章一至二篇不等。《战国策》半月刊和《战国》副刊所刊载的文章聚焦世界局势的变化，并推演世界局势的发展，其所传达出

[1] 《战国策》编者（林同济）：《〈战国策〉停刊启事》，载贵阳《中央日报》1942年4月4日。

独特的思想文化主张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于是就在《战国策》半月刊和《战国》副刊这两个综合性文化刊物刊行之际，时人便认为两刊的编者及作者群代表了一个新的思想文化流派，并多以“战国策”派（或“战国”派）名之。

尽管“战国策”派的称呼由来已久，但当时乃至当下关于“战国策”派的成员构成众说纷纭而未有定论。徐传礼曾在《历史的笔误和价值的重估——“重估战国策派”系列论文之一》中对“战国策”派的成员构成做出过相对明确的界定，并提出狭义“战国策”派和广义“战国策”派的对举概念。其中，狭义“战国策”派只限于“战国策社”同仁，“即林同济、雷海宗、陈铨、何永佶、沈从文5人”，“此外，还有没有别的战国策社同仁，尚待考察”^[1]。至于广义“战国策”派则包括“《战国策》、《战国》作者41人”，以及在林同济、陈铨主编的“在创丛书”（共9种，由上海大东书局在1946年5月至1947年3月期间出版）中新出现的3位作者——陈序经、伍启元、杜才奇，即“一共44人”^[2]。不过，徐传礼还进一步认为，“广义的战国策派，还应包括《民族文学》^[3]作者群以及在思想倾向、学术观点上支持、赞赏他们的人”，如柳凝杰、陈湖、荆有麟、徐訏、张荫麟、张恨水等人。^[4]徐传礼对“战国策”派成员构成的界定提供了新的思路，但他提出的狭义“战国策”派和广义“战国策”派的说法依然有待商榷。江沛在《战国策派思潮研究》一书中指出，《战国策》半月刊原有26位“特约执笔人”，“分别为：林同济、雷海宗、陈铨、贺麟、朱光潜、费孝通、沈从文、郭岱西、吉人、二水、丁泽、陈碧生^[5]、沈来秋、尹及、王迅中、洪思齐、唐密、洪绂、童禔、疾风、曾昭抡、何永佶、曹卣、星客、上官碧、汀口”^[6]。然而，《战国策》半月刊上的署名并不限于这26个，还包括“陶云逵”、“公孙震”、“林

[1] 徐传礼：《历史的笔误和价值的重估——“重估战国策派”系列论文之一》，载梁潮主编：《东方丛刊》（1996年第3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01页。

[2] 徐传礼：《历史的笔误和价值的重估——“重估战国策派”系列论文之一》，载梁潮主编：《东方丛刊》（1996年第3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02页。

[3] 在《战国》副刊因故停刊后的第二年——1943年7月7日，作为“战国策社”创始人之一的陈铨借“七·七”事变6周年纪念之机创办《民族文学》月刊，但《民族文学》月刊也仅出至第1卷第5期便于翌年1月终刊。《民族文学》月刊偏重文学研究，强调中国文学的民族性，而这种民族文学主张其实是《战国策》半月刊和《战国》副刊之思想文化主张的延展化和具体化。应该说，《民族文学》月刊也是“战国策”派的重要刊物之一，可惜至今都尚未引起学术界研究者的足够重视。

[4] 徐传礼：《历史的笔误和价值的重估——“重估战国策派”系列论文之一》，载梁潮主编：《东方丛刊》（1996年第3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9月版，第202页。

[5] 原文如此，“陈碧生”疑为“陈碧笙”之误。

[6] 江沛：《战国策派思潮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2页。

良桐”、“郑潜初”、“冯至”等。《战国》副刊上则出现了更多的新署名，如“独及”、“望沧”、“吴宓”、“冯友兰”、“钰生”等。在这些署名中，有真名，也有化名、笔名。关于这些署名——尤其是其中的化名、笔名的归属，至今都尚无确切、统一的说法。^[1]于是，《战国策》半月刊、《战国》副刊的撰稿者身份及其数量便难以遽断。因此，徐传礼提出的狭义“战国策”派的概念太过具体而失之武断，广义“战国策”派的概念则太过笼统而失之泛化。

客观而言，《战国策》半月刊、《战国》副刊撰稿者身份的不确定性必然会导致“战国策”派成员构成的模糊性。但是，“半个多世纪以来，前人在对战国策派思潮进行褒贬时，一般多围绕着发表文章最多、观点最具代表性的林同济、雷海宗、陈铨、何永佶、贺麟等人进行”，因为“一般认为，战国策派的核心人物即是林、雷、陈、何、贺五人”^[2]。于是，林同济、雷海宗、陈铨、何永佶、贺麟被称为“战国策”派的“五大主将”，而其中的林同济、雷海宗、陈铨则更被称为“战国策”派的“三驾马车”。然而，这些说法不免有所偏颇。表 0-1 和表 0-2 分别给出了在《战国策》半月刊和《战国》副刊上发表 2 篇以上文章的作者情况统计。

表 0-1 《战国策》半月刊作者情况统计表^[3]

署名	《战国策》半月刊期号	篇数
何永佶	1、2、3、4、5、6、8、9、10、11、12、13、14	13
陈铨	1、3、4、6、7、8、9、12、13、14、15—16、17	12
林同济	1、3、4、5、6、12、13、14、17	9
沈从文	1、2、3、5、9、10、13	7
尹及	1、2、5、7、8、9、11	7
吉人	1、2、9、11、14	5
洪思齐	3、4、5、7、10	5
丁泽	3、5、7、11	4

[1] 一般都认为，“望沧”、“独及”是林同济的笔名，“唐密”是陈铨的笔名，“尹及”是何永佶的笔名，“上官碧”是沈从文的笔名，其余署名尚待考证。有论者认为“公孙震”、“星客”、“洪思齐”分别是林同济、陈铨、洪绂的笔名或化名（桑兵、关晓红：《先因后创与不破不立：近代中国学术流派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7 年版，第 515 页。），但有待进一步考证。

[2] 江沛：《战国策派思潮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3 页。

[3] 第 9 期署名“永佶”的文章归入“何永佶”；第 5、13 期署名“同济”的文章归入“林同济”；第 13 期署名“从文”的文章归入“沈从文”；第 1、4、17 期署名“岱西”的文章归入“郭岱西”。

续表 0-1

署名	《战国策》半月刊期号	篇数
星客	5、8、10、12	4
郭岱西	1、4、15—16、17	3
雷海宗	6、11、15—16	3
王迅中	2、6	2
贺麟	3、17	2
陈碧笙	7、14	2
费孝通	9、12	2
沈来秋	11、15-16	2

表 0-2 《战国》副刊作者情况统计表

署名	《战国策》半月刊期号	篇数
何永佶	1、2、3、4、5、6、8、9、10、11、12、13、14	13
陈铨	1、3、4、6、7、8、9、12、13、14、15—16、17	12
林同济	1、3、4、5、6、12、13、14、17	9
沈从文	1、2、3、5、9、10、13	7
尹及	1、2、5、7、8、9、11	7
吉人	1、2、9、11、14	5
洪思齐	3、4、5、7、10	5
丁泽	3、5、7、11	4
星客	5、8、10、12	4
郭岱西	1、4、15—16、17	3
雷海宗	6、11、15—16	3
王迅中	2、6	2
贺麟	3、17	2
陈碧笙	7、14	2
费孝通	9、12	2
沈来秋	11、15-16	2

续表 0-2

署名	《战国》副刊期号	篇数
林同济	1、4、7、17、19、27、28、29、30	9
陈铨	3、6、9、21、24、25、31	7
雷海宗	2、10、13、14	4
公孙震	3、5、20	2

其中，在《战国策》半月刊上，曹卣（2）^[1]、二水（2）、唐密（4）、洪绂（6）、思齐（6）、朱光潜（7）、童禔（8）、上官碧（8）、疾风（10）、汀口（10）、曾昭抡（12）、陶云逵（13）、陈雪屏（15—16）、公孙震（15—16）、林良桐（15—16）、郑潜初（15—16）、冯至（17）、王季高（17）、陈毓棠（17）各发表1篇文章。而在《战国》副刊上，吴宓（2）、E.R.（7）、独及（8）、望沧（9）、沈从文（11）、沙学浚（12）、王赣愚（15）、冯友兰（16）、谷春帆（18）、钰生（18）、陶云逵（23）、梁宗岱（25）、唐密（26）、岱西（26）各发表1篇文章。很显然，仅就发表文章的数量而言，直署贺麟的文章总共就只有2篇，所以贺麟似乎难以位列“五大主将”之尊。与此相对，积极发文并直署真名的沈从文竟然无缘入围“五大主将”。这一切，不免让人大感匪夷所思。似乎学术界评定“五大主将”的标准并不在于这些撰稿者所发表的文章的数量而在于文章的质量，也就是文章内容所体现出来的所谓“观点最具代表性”。

在所谓的“五大主将”的文章中，其实只有三种观点比较有代表性，也最惹人注意和争论。首先是“战国时代重演论”，以林同济为代表。《战国策》半月刊第1期第一篇文章即为林同济的《战国时代的重演》，而《战国》副刊第1期也只刊登了林同济的《从战国重演到形态历史观》一文，此外林同济还在此后的一系列文章中不断地对“战国时代”的特征和意义加以详尽的生发论述。其次是“文化形态史观”，以雷海宗为代表。身为历史学家的雷海宗与其他撰稿者有所不同，他往往只坚守一隅，仅在史学范畴内运用德国学者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 1880-1936）开创的“文化形态史观”分析中外局势，如《中外的春秋时代》（《战国策》半月刊第15—16期合刊）、《战国时代的怨女旷夫》（《战国》副刊第2期）等，并在后续的文章中不断地对这种史观进行修正，如《历史警觉性的时限》（《战国策》

[1] 括号中的数字为期号，下同。

半月刊第11期）、《独具二周的中国文化——形态史学的看法》（《战国》副刊第14期）等。第三是最具争议性的“英雄崇拜论”，以陈铨为代表。陈铨在《战国策》半月刊第4期上发表《论英雄崇拜》，主张崇拜英雄，同为《战国策》半月刊和《战国》副刊撰稿者的沈从文却旋即《战国策》半月刊第5期上发表《读〈英雄崇拜〉》一文率先进行质疑。此后不久，许多学者蜂拥而起，在其他刊物上一再撰文批评陈铨的“英雄崇拜论”。而贺麟在《战国策》半月刊第17期上发表的《英雄崇拜与人格教育》一文虽从哲学方面进行立论，但本质上还是支持英雄崇拜，这可能就是他成为“五大主将”的原因之所在。在这场关于英雄崇拜的论争持续了两年之后，陈铨又在《战国》副刊第21期上发表《再论英雄崇拜》一文，重申前文。

由此观之，贺麟难以入围“五大主将”。何永佶的观点虽然并不突出，但因其所发文章数量较多，还可勉强加入“五大主将”之列。然而，如果仅仅以发文量多少为准绳，那么积极发文的沈从文也应成为“五大主将”之一。所以，“五大主将”的说法，失之恰当。林同济、雷海宗、陈铨三人的观点虽然独具个性，但称其为“战国策”派的“三驾马车”也有所不妥。这三人的观点其实没有太大的互融性，雷海宗和陈铨的独具特色的代表性观点也并不被整个流派的成员所普遍接受，尤其是陈铨的观点更是遭到了流派内大多数成员的普遍质疑。作为一个流派，其成员的主要观点应该是基本一致的，更不用说核心成员的观点了。学术界的研究者们专注于贺麟的《英雄崇拜与人格教育》一文时，便毫不犹豫地将他归入“五大主将”之列；看到何永佶撰写的文章数量时，却忽略了沈从文撰写的文章数量，其中的矛盾未必没有人知道。然而同样的，坚称林同济、雷海宗、陈铨为“战国策”派的“三驾马车”时，却忽略了他们的共性。

就如这个流派成员的构成难以完全确定一样，“战国策”派和“战国”派这两种流派名的通用已然昭示出学术界的研究者们对这个流派的概念的厘定不清。称之为“战国策”派，一般是因为他们创办过《战国策》半月刊；称之为“战国”派，一般也是因为他们最先创办过的两种刊物中都带有“战国”二字。当然，这两种称呼也都包含了该派成员所普遍接受的“战国时代重演论”的意义。然而，在那个“抗战”进入相持阶段的非常时期，难道他们仅是为了向世人昭示这是又一个“战国时代”，进而好战到鼓吹战争？当时乃至后来，确实有人这样认为。“战国时代重演论”固然是“战国策”派共拥的理念，而“战国策”派也恰恰由此才引申出他们所谓的“大